

北國周末

BEI GUO ZHOU MO

收过二手手机、骑过三轮车、在银行门口倒过国库券……从警14年的杨平，是昆明市公安局便衣侦查分局一大队副队长。和以前从事的刑侦工作相比，杨平认为，现在的便衣工作，可以让他“更纯粹地体会到警察的职业感”。

作为我国首家便衣警察分局，2004年12月6日，昆明市公安局便衣侦查分局400立，设有5个大队31个中队。

为了隐蔽，分局办公大楼没有挂牌，局里的400名民警，每天大多分布在昆明车站、码头、城中村及其他案件高发地带。办案过程中，他们身着便服，还经常化装成擦皮鞋者、三轮车夫或是小商贩等。杨平告诉记者，“我们每个民警都有一两套旧衣服，便于执行任务。”

“‘便衣’，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公安机关针对反抗设立的。”昆明市公安局便衣侦查分局局长马宁告诉记者，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居民小区等社区管理的逐步改善，城市公共区域如街面犯罪等日益突出，尽管属地民警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的公开管理方式，对于具有隐蔽性、潜在性的街面犯罪，还是存在一定局限。

2004年，依据“警务跟着警情走”的理念，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便衣分局，“便衣警察没有特定的管辖区域，可以根据警情迅速调整力量，在研判、分析犯罪情报信息后，再决定投入的警力和地段。我们力求用最小的警务成本来获取最好的管理效率，针对性、目的性很强。”马宁说。

和其他警种相比，便衣分局没有接处警任务，工作方式也从“由案找人”向“由人找案”转变。“过去，警方一般是在发案并接到报警后再查找犯罪嫌疑人。便衣分局打破了这种传统模式，根据获取的情报信息，发案前就对嫌疑对象进行跟踪侦查，在其作案时人赃俱获。”

隐蔽观察、秘密监控和跟踪盯梢，是便衣侦查最基本的方法。去年，昆明闹市区有盗窃团伙连续作案，群众反响强烈。但由于直接作案人员多为未成年

人，公安机关难于打击处理。便衣分局在这些未成年入经常作案的地点，实行秘密监控和跟踪，获取了操控未成年入作案的幕后黑手教唆、收取赃款赃物的证据，将该团伙一网打尽，抓获12名嫌疑人，追回财产损失达10余万元，其中仅手机就有127台。

马宁介绍，便衣分局以构建大情报信息平台为基础，实现情报信息导侦、导控，以“人、地、事、物”来找案。如果犯罪事实不清、没有充分证据，一般不准轻易抓人。此外，为保证足够警力控

探访中国首家



制街面，便衣分局在组建时，就明确了“只侦查抓捕不办案”的原则，分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一律交属地公安机关处理。

便衣分局组建近3年来，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244名，打掉盗窃犯罪团伙341个。由于便衣队伍的加入，昆明市在总警力不变的情况下，主城区街面防控警力增加了16%，高发案区域防控力量增加了34%。

说起便衣警察，昆明市民陈先生表示，好多年前看过电视剧《便衣警察》，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有不表明身份的便衣警察来找我了解情况，我可能不会配合。问题大多会涉及个人隐私，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便衣警察的作用很重要，在公安机关中必不可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告诉记者，便衣警察制度，在各国普遍存在，作用很大，特别是对于毒品犯罪、涉黑犯罪和盗窃犯罪，没有便衣警察，很难侦破。

马宁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一家成建制设立的便衣分局，昆明便衣分局是独立的执法机构，有立案权、侦查权，至于执法权限、执法范围，“凡是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应该办理的，包括治安管理等在内，我们都可以办理。”

“作为一名便衣民警，首先得练好两项基本功：‘火眼金睛’和‘七十二变’。”马宁说，“火眼金睛”，就是发现和识别犯罪嫌疑人；“七十二变”，则是化装成与工作区域相符合的身份，让自己更好地隐藏到人群中甚至犯罪嫌疑人中去。(敬文)

便衣警察分局

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红顶商人王效金

记者日前从有关方面获悉，安徽省检察院近日以涉嫌受贿罪对该省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亳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效金进行立案侦查。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已决定终止王效金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目前安徽省检察院反贪部门正在对其进行追捕，案件尚在进一步侦查中。

今年58岁的王效金，1987年8月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1992年12月任亳州市副市长、亳州古井酒厂厂长，1996年7月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古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00年6月，王效金任亳州市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2004年3月任亳州市政协副主席并兼任古井集团董事长、总裁，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已初步查明，1991年10月至2007年2月，王效金利用担任古井集团董事长等职务之便，先后收受有关公司、酒厂的董事长等人的贿赂达数百万元，为行贿人在广告业务承接、产品供应、货款支付、经营代理等方面提供便利。

另据介绍，在王效金被安徽省检察院立案侦查前，亳州市检察院已相继对古井集团的8名进行了立案侦查。今年9月底，该院又对古井集团原副总裁、有古井集团“二把手”之称的刘俊德进行了立案侦查。至此，包括王效金在内，该集团已有10名高管因涉嫌受贿罪受到检察机关的立案查处。(吴贻伙)

责编：宫望峰
版式：陈幼敏
校对：王军生
http://www.sxworker.com

陕西名酒 三粮液
百年三粮液
财富热线:0916-3296284
0916-3210008

响一声就挂的骚扰电话究竟

“铃——”深夜的寂静中，北京的尹先生被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响了一声的铃声却戛然而止。13××××02703，一个陌生的号码。回拨——“……这里的服务应有尽有，定能给您超乎寻常的享受。有意请……”一段含有色情挑逗内容的话语从电话那头传来，听上去是事先录好的留言。

类似这样的“午夜来电”，相信不少人都曾经接听过。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骚扰电话实际上以骗财为目的，人们在接到不明来历的陌生电话时，回拨一定要谨慎。

语音留言传播不良广告，“午夜电话”不为骚扰为骗财

互联网上有一篇题为“警惕！那些响一声就挂断的电话”的帖子。在这个长达4页的帖子里，跟帖的网友一直“爬”上了76楼，他们把自己接到的那些陌生号码公之于众，并展开了热烈声讨。

“这种电话骚扰真可恶，真应该好好管管这些人！”“回拨回去就是语音留言，让人有种上当的感觉！”网友们对“午夜来电”不胜其烦。

这些讨厌的电话究竟从何而来呢？记者联系有关通信运营商，了解到这些来



电都是预付手机号码，购买时不需要登记机主资料，机主通过设置无条件呼转，将来电转到自制的语音留言平台，使手机成为播放广告的工具。

据了解，神秘的“午夜铃声”目的不在骚扰，而是为了做广告。被拨打的用户回拨之后就被呼转到不法分子自制的语音留言平台，除了被迫收听那些色情信息、六合彩信息之类的广告外，还要支付基本通话费。在有些城市，回拨用户还被接入昂贵的付费声讯台，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据了解，这些机主后面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专业地下广告商，专门利用手机播发不法广告来牟利。

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就是此种手机骗术的一个受害者。他在香港时回拨一个不明来电，被扣除了不菲的通话费。“这些利用手机诈骗的新手段，比垃圾短信还恶劣，让用户防不胜防。”

不法分子采用无主号码，监管难点在于不易及时发现

对于一些不法分子借助手机平台侵犯消费者权益合法权益的行为，通信运营商也有苦衷：“不法分子频繁换号，监管的最大难点在于难发现。

从何而来？

只有不法行为的次数多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能发现、确认，并进行处理。目前更多的是依靠用户投诉。”

据广东移动公司数据业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移动已经建设了10086999举报平台，一旦接到群众有关垃圾短信、彩信和骚扰电话的举报，会及时与执法机关联系处理。

记者试着拨打网友提供的那些手机号码，得到的回答不是“您拨打的号码不存在”，就是“用户留言信箱已关闭”。

“处理类似的情况，需要政府和通信企业合力破解。”移动公司表示，作为国有企业，移动从

组织制度建设、资费策略、合作单位监管、网络监控处理、投诉快速处理、技术手段建设等各个方面开展防范和监管。但同时，限于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他们不能侵犯正常用户的隐私，更不能直接执法，只能在职能权限范围内尽全力避免侵害用户利益的不法行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电信运营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畅通有效的投诉机制，凡是接到用户投诉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

记者了解到，散布色情和地下六合彩广告，本身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但与垃圾短信、短信欺诈等一样，由于很难掌握机主信息，公安机关也难以进行有效打击。

另外，由于在打击利用手机进行不法活动方面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有关部门及通信运营商对此类行为监管乏力。他们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完善立法，加大打击力度。(同查)

北京大白菜涨价

北京大白菜上市就比去年同期涨了数倍，由去年同期的每斤一毛二涨到四毛，对于每年冬季来临时一个消耗六亿公斤的北京市民来说，可谓不是一件小事，因为相形之下，北京老百姓们在这个冬季要在白菜上多支出数十亿的钞票。

眼下，食用油又在悄悄的涨。这已经是第二次冲击波了，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那么，今年首先开始涨价就是食用油中的花生油。如今领涨的是它，发起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又是它。

当然猪既不能催生，又不能速成，肉价也就不得不在“高位上盘旋”。要想猪肉在近期内有有一定幅度的回落可能性也是不大。

三件事，都是极其普通的小事，但事关衣、食、住、行中的“食”字，又不得不以此为大，因为所谓我们关心民生中的“民以食为天”，这太大了，太重了。

日前，关于食用油价的上升，又有了表态了，说食用油储备多了去了，完全可以满足供应，既然可以满足供应，以供关系决定的食用油价为何屡屡上涨呢？这实在是令人糊涂的经济学。再说到大白菜，据说是京城去年的菜价伤了人心，所以今年种植面积大幅度的缩减所致，物以稀为贵，成倍涨的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这种眼皮子底下的事，都弄成了这样，着实是让人想不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把关注民生作为大事来抓，把“执政为民”具体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民生是些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就是老百姓们居家日常生活的问题，当然百姓们的“菜篮子”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更包括大白菜、油料、猪肉等。我们的实际工作到底做得怎样呢，前天是油的问题出来了，昨天是猪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现在连大白菜的问题出来了，照此下去，明天、后天呢？是不是“西瓜、芝麻”之类的问题也要出来了？我们的整个民生的“监控”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对基础产业特别是养殖种植的“正确引导”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产业安全又“安全”在什么地方呢？难道只有老百姓们不情愿地从荷包里大把地掏了票子以后，才能得到有关部门提襟见肘的搪塞，促使有关部门的“恍然大悟”么？

一个生猪养殖上的监控，引导上的失误，造成整个CPI的上升，已经让“民生”吃不消了，国家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监控”却让皇城根下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菜成倍涨价，“引导”自然也就无从说起。如果还是一句话——靠天收，如果还是这样的“监控、引导”，再或由“大白菜”之类的引起的涨价波，让“民生”又何以作答呢？(景阳)

谁把正常人变成了“精神病”？

要防止弱势群体产生偏见，认为利用法律、寻求权力帮助是一件最冒险的事情，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样的局面一旦产生，蔓延，就会使弱势群体减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与信赖。坦率讲，在当前中国，这种告诫显得尤其紧迫。

1997年，因反映家庭暴力，河南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被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7年后，江帆历尽周折才见到这份改变自己命运的司法鉴定书。更让她惊讶的是，把地这个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人”的竟是当地4名精神病专家，而给她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最初起因是开封市有关领导的指示。(10月31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领导“要严密看护，看精神是否受到刺激”的批示，便可以马上演变为“根据领导指示，对江帆进行精神异常鉴定”的行动；一次次求助法院，在接到领导指示、不满当事人上访等情形下，法院始终没能输出该有的正义，反而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经历了十年的屈辱与奔波之后，当事人江帆说：“法院本来是解决纠纷的机构，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政府应当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责任是保护公民。我不希望连街道小脚老太太都能

解决的问题，因为麻木和不负责任而一步步地升级。”

“拿起法律的武器”，这些年来，我们常能听到对弱势群体如此的忠告。但屡屡发生的类似事情却提醒我们：利用公共权力(包括上访、上告)的武器，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常常会面临失去对“武器”控制的危险；求助公共权力的帮助，已经不是简单的“能收效”的问题，而很可能要冒着被私人指责、排斥甚至打击报复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从这种权

力当中一无所获。

公民为什么会徘徊于政府、法院的周围去上访、告状？一定程度上，正是要寻求某种公共权力对于个体权利的救助——这是以对公共权力的信赖为前提的。如果公共权力不能及时提供这种服务，甚至过于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违背政治科学规律，唯上、唯权、唯己，干出这样那样的荒唐事儿，只会是与政治文明的目标背道而驰。

经历了十年的屈辱，如今憔悴不堪的江帆说出了一句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依然相信法律。”我们是不是要感谢这个“顽固”的公民——感谢她没有轻易放弃对于公共权力的信任，感谢她用一个极端的个案给了我们一次自省和反思的机会。

我们有了一整套的政治、司法体制，多年来也得到了公众的信任，否则江帆不会执著地“依然相信法律”。但是，当这种信任遭遇越来越多现实风险冲击的时候，当这种风险支出之后仍然会一无所获的时候，我们又能够依靠什么维护公民“始终相信法律”的信心？(毕诗成)

周末评论